

## 观展

韩浩月

黄永玉把“入木”两字写得入木三分。这两个字，是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办的版画艺术展主题。像以往办展览一样，这次他也给自己的版画展写了序言，其中有一句他这么说，“木刻是个累活，累上瘾改不回来了，就这么刻了我半辈子。”

黄永玉对这次版画展十分重视，他手举着印有“入木”的精美邀请画，在沙发上摆出顽童般的造型，拍了一幅照片。开展当天，他时竟地连线“检阅”自己的作品……木刻，这一逐渐离大众远去的表现形式，借黄永玉之名，再次引起了关注。

黄永玉对版画展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希望把妻子张梅溪出版的童话书《在森林中》中所有插图都展出来，这是他对妻子的一种纪念（今年5月，张梅溪于香港去世）。张梅溪永远是黄永玉版画的第一位欣赏者。有一个故事，说的是年轻时的黄永玉兜里没钱，在理发和买木刻板之间犹豫，张梅溪让他去理发，约好等会儿门口见。黄永玉理发完出来，张梅溪正捧着一块崭新的木刻板，送给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。

木刻与黄永玉的青春、爱情、艺术、生活，都有着紧密的联系，他说木刻“刻了我半辈子”，也可以理解成，木刻曾经是他生命中最重要、最深的印记。12岁的黄永玉离开湘西到厦门集美学校，抗战爆发集美学校迁到安溪文庙后，黄永玉开始学习木刻，雕刻了大量作品。这些作品发表在各地报刊上，引起很多关注。学者李辉这样评价黄永玉木刻的“横空出世”：“黄永玉的精彩亮相，可谓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运动的一个惊喜。”



▲黄永玉作品《阿诗玛》 新华社资料片

木刻，的确是黄永玉作为艺术家成名道路上的第一块“敲门砖”。1947年，沈从文的著名作品《边城》中就出现了黄永玉的木刻插图。1948年，时任《大公报》副刊编辑的萧乾为24岁的黄永玉在香港举办了首次画展。《良友》画报的主编马国亮熟悉鲁迅身边的诸多木刻家，但对黄永玉刮目相看，“他竟是这样年轻，和他成熟的作品很不相称。”汪曾祺后来给《大公报》撰文，称赞黄永玉的木刻作品里，有着和性格高度一致的“一种童话似的快乐，一种不可损伤的哭声”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，黄永玉的木刻创作基本停止，开始转向其他艺术领域，他写作、雕塑、画紫砂壶，每一样都取得非凡成就。近年更是以自传体“大工程”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的写作而令人钦佩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凭借黄永玉金句，他成为“风潮人物”……种种光环之下，他的木刻成就反而被掩盖了。

黄永玉累计创作了300余块版画作品，幸运的是，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保存了下来，其中一些早期作品，是专为本次展览从香港装箱带回北京的。在黄永玉看来，打包带回的不仅是他一笔一画刻下的作品，更是一份记忆，就像他所说的，“我怎么活过来的？要不看不到这些木板，我几乎忘记了。唉，千山万水贴着肉的、贴着肉的什么肉，贴着肉的骨头吧！这一堆骸骨啊！”……历史、记忆与情感，此刻汇聚在一起，任谁，都会心生感慨。

黄永玉的木刻作品，有风格的不同，但却没有起步期、发展期与成熟期的区别。在他刚开始发表木刻作品时，就已经有了大家风范，原因恐怕在于，他通过自己手中的刻刀，往一块块木板上注入了太多的热爱、纯粹、快乐。他有一幅看上去有些“例外”的作品，即1948年为诗人陈敬容一首同名诗而创作的《逻辑病者的春天》，这幅很抽象、很当代的作品，至今看上去仍然耐人寻味，据说黄永玉自己也很偏爱这幅作品。

在版画爱好者心目中，黄永玉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大幅木刻《春潮》是经典代表作之一。版画中一只巨大的鼠蹩跃出海面，等待着他的是两个渔民抛出的长竿，在鼠蹩身下，是汹涌激荡的海潮，还有大大小小的其他鱼儿。画面动感奔涌，生机勃勃，在危险与多变的气息中，洋溢着一种生命的力量，值得久久凝视欣赏。

1953年，刚从香港回北京定居不久的黄永玉来到云南，根据撒尼人的民间叙事长诗《阿诗玛》，创作了一套十幅木刻版画。鲜艳的色彩、细腻的线条以及辨识度很高的民族特征，使得这套作品几乎成为他的流传面最广的版画。最好的致敬是被借鉴，音乐歌舞故事片《阿诗玛》以及销量很大的阿诗玛香烟，在人物造型上都能明显看出借鉴了黄永玉的木刻。一个凝固于版画上的人物形象，也因而更生动地走进了大众视野。

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，也被认为是现代木刻的拓荒人。1930年前后，他不仅出版了《近代木刻选集》《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》等画册，还亲自租场地举办了三次木刻展，为西方版画艺术与与中国传统木刻艺术的碰撞制造了机会。鲁迅的这个做法，也被认为是增强了上世纪中国艺术创作的丰富性。在整个木刻创作评价体系中，黄永玉的作品被认为可以满足所有专业上的“尺子”的衡量，是中国现代木刻创作者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1948年，老舍在《谈中国现代木刻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他们必须张大眼睛和耳朵，去观察注意周围的世界，从他们观察所得，便产生了现代的中国木刻。”黄永玉前半生的艺术创作便是如此，他从身边的世界捕捉画面，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，将那个时代的生活与艺术，定格于一块块木板上，这是他前半生的追求，也是他越擦越亮的荣誉。

# 「入木」黄永玉

前走。在临近毕业的一场招聘会上，我像贴牛皮癣广告一样，一见到招聘单位就将自己的应聘材料“贴”上去，最终勉强找到一个饭碗，让自己不至于一出校门就挨饿。

此后，因为工作关系，也因为深埋心间的教师情结，我常常拜谒默默奉献在大山里的老师，对这份职业又多了几分了解，对那份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奉献精神多了几分敬意。

中越边境有一位老师，他所在的教学点唯一的一名正式老师已经调离18年，此后一直没有正式老师来接替这个空缺岗位。由于家在学点附近，他一手拿着退休证书，一手接过返聘证书，重返讲台撑起大山孩子梦想的蓝天。

我到访的时候，他正在给教学点的五个小孩上课，琅琅书声在边境线上阵阵回荡，偏远的山村因此多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是1400多元，如果在建筑工地上打工，每天至少有200元收入，但为了孩子们有老师教，他选择了继续坚守。

桂北有一位老师，在一次家访途中被毒蛇咬伤右脚，造成小腿肌肉萎缩、骨骼坏死，成了残疾人，用一条腿支撑山区孩子的求学梦。退休后，因为没有新老老师愿意来到这所大山教学点接替他的岗位，他一手拿着退休证书，一手接过返聘证书，重返讲台撑起大山孩子梦想的蓝天。

桂南大山里有一所偏僻的教学点，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师每天骑摩托车翻山过坳给孩子们上课，早出晚归，风雨不改，一个来回接近十公里的山路，顶着一头白发坚守贫困大山。

那天，我站在高高的山坳看着这位老师骑着摩托车穿越大山，当这位老师的背影在大山夕阳下定格成剪影的那一刻，崇敬和仰望的旗帜，瞬间在我心灵的原野猎猎飘扬，坚守大山的教师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，如同茫茫大山中冉冉升起的太阳。

此后，我穿越大山，行走边境，尽可能多地拜访那些默默坚守在偏远教学点的老师。用影像记录他们的精神面貌，记录在山高路远最深处，他们为了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，那份清贫的坚守与无私的付出。

这些老师是我国教育最基层、最基础、最艰辛、最不可或缺的中干上万名教育工作者中的一部分。坚守大山，坚守清贫，我无法亲身体会这其中的酸甜苦辣。但是，每当翻开这些照片，这些老师定格在我的心灵底片上那份坚守、那份情怀，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感动着我。

每当此时，我又想起我的父亲，想起那些一笔一画教我识字、呵护我一路成长的老师们，我深埋在童年心田深处的教书梦，又一次次泛起，层层荡开。

文字见证了大师内心的灼热情怀：

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清景无限。曲港跳鱼，圆荷泻露，寂寞无人见。就如三鼓，铿然一叶，黯黯梦云惊断。夜茫茫，重寻无处处，觉来小园空巷。

天涯倦客，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心眼。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？空锁楼中燕。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，但有旧欢新怨。异时对，黄楼夜景，为余浩叹。

苏词中，有一组看上去似乎远离了豪放派风格的作品，即《浣溪沙》，它所歌咏的乃是徐州乡间生活。如：

簌簌衣巾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缫车。牛衣古柳卖黄瓜。  
野田黄雀快如睡，日高人渴漫思茶，敲门试问野人家。

清新而质朴，像午后乡间一阵安详的微风，又像微风水波不兴的湖面。这首词的来历，也和下雨有关——看来，苏东坡是与龙王打交道的老手了。那年求雨得雨，徐州风调雨顺，苏东坡前往龙王庙表示感谢。正是暮春时节，苏东坡和随行人员免不了在龙王庙里喝喝酒，菜品就是那只名义上献给龙王享用的猪头。

求雨的灵验预示着苏东坡心情不错，他喝得有点高了，回城路上，他放着轿子不坐，乘着酒兴一路走来。远近百姓早就听说名满天下的知州大人来了，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，跑到路边一睹大人尊容，尤其是那些年轻女子，个个粉面含春，伫立在暮春的微风里。

苏东坡脚步有些迟缓，脸色出奇红润，他向父老乡亲们问好，还不时和那些须发花白，看去年纪一大把的长者拉拉手。一个喝醉了的老头干脆睡在路中间，一点也不怕知州大人下令打他的屁股。这个春风浩荡的下午，姑娘们的笑声在风中飘散，苏东坡内心的喜悦与自得如春潮涌动，回到官署，他写下了这组《浣溪沙》，那是一种和民间水乳交融的生命喜悦，感受受到了乡土与人情的浸润：

旋抹红妆看使君，三三五五棘篱门，相排踏破石榴尘。  
老幼扶携收麦社，乌鸢翔舞赛神村。道逢醉叟卧黄昏。

……  
知徐州两年后，1079年三月，苏东坡调湖州。七月，深文周纳的政敌将苏东坡陷入一场可怕的文字狱：苏东坡被解往开封，关押于御史台监狱。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。

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的一大转折，他宦游之路的上半场结束了，他天真烂漫的诗酒生活开始罩上浓重的阴影。不过，他正值壮年，他还有机会，而人生之路的一波三折，也才刚刚开始……

# 今生有个教书梦



▲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汪洞乡新合村，达佑教学点教师周宏军午饭后备着学生回学校上课（2019年5月28日摄）。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

朗诵解读《岳阳楼记》那样的名篇美文，“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。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；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……”一副老先生的模样，摇头晃脑，解文说字，抑扬顿挫，如痴如醉。

后来，我还真当了一阵子教师。临近毕业，我们班到桂北一所乡镇中学实习，我在那里初尝为人师的酸甜苦辣。每天，我们天还没大亮就得起床，催学生起床吃早餐，陪着他们做早操、上早读，给他们上课。晚上，我们得守在学生宿舍外，和调皮不按时入睡的学生几经充满战略战术的周旋，等他们全部入睡后，才能回到宿舍洗刷一天的疲惫。

这个职业与生俱来的责任、担当与忧思，绝不比其他行业少。老师每天要面对几十个生长环境不同、家庭条件不一、性格禀赋各异的孩子，通过自己一张婆婆妈妈的嘴巴、一副观点点拨悟空修正果敢大道的心肠，春风化雨般感化他们，给他们增进人生才干的知识，教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。

这不是大道理，而是需要从点滴做起。成绩好的，要不间断帮他；成绩差的，要知道根源在哪里，怎么去帮助他。家庭条件不好的，想着办法帮助他；生活受挫的，想着办法鼓励他……有时候恨不得像机械化生产那样，定一个标准，做一批模子，一口气把他们塑造得一模一样的优秀、一模一样的完美。

一个学生在作文里写了他的家，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父亲经常外出赌博，母亲一个人里外操劳，家里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吵闹不休，他为此感到十分困惑，每次听到父母的争吵，他心里充满了恐惧，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，让这个家少一点吵闹，多一点欢笑。

不长的文字里满是一个孩子心灵的伤痕。我拿着作文找他谈心，他低着头把家里的情况再和我讲一遍。此后，我特别关注他，一再鼓励他好好学习，通过知识改变命运。本来想到他家去看看，因为人生地不熟，加上实习时间很短，始终没有实现。直到现在，我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孩子，不知道他后面学习怎么样，他家现在过得怎么样。

短短的一个月实习里，我们付出了心血，也收获了感动。在结束实习时，孩子们自发制作卡片，写上留言送给我们，只言片语满是他们的不舍和祝福。我们班一位同学在实习返程的车上，捧着学生送给他的卡片，心里满装着对学生的不舍，七尺男儿，放声大哭。

有朋友问我，老师很多时候都是用同样的教材周而复始地教学生，他们的乐趣在哪里？我想，心血辛勤无私地浇灌，双手托起梦想的蓝天，呵护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快乐成长，这应该是老师的乐趣，也是为人师表的价值。

可是，我为了生计没在这条路上继续往

## 苏东坡的人生地理(上)

纳了建议。在被大水围困了70多天后，徐州城终于转危为安。当苏东坡回到官署时，他发现房顶的瓦上也留下不少泥沙。

劫后余生的苏东坡饮酒作诗，他在诗里感叹：“岁寒霜重水归壑，但见屋瓦留沙痕。入城相对如梦寐，我亦仅免为鱼鳖。”

这一年的一场大水，也让苏东坡生出远虑：如果不主动采取进一步措施，悲剧也许明年还会重演。于是，苏东坡向朝廷提出，希望增筑徐州城堤。他在诗中说：“明年劳苦应更甚，我当奋锄先驱。”

次年开春，朝廷批准了苏东坡的请求，徐州外城得以顺利筑筑和加固。为了镇住黄河水患，实实在在筑堤是必要的，而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修黄楼，也是必要的——苏东坡在徐州东门外建了一座楼，用黄土涂刷外墙——古人的五行学说认为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，其中，土克水。

1078年九月初九，黄楼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。据说由于黄楼太高，一些年迈体衰的老人仁立楼头，竟然十分寒冷，苏东坡只好命人给他们送来几壶热酒暖身子。

为了纪念这一盛事，苏东坡写了《黄楼赋》，并勒石刻碑。据说，碑上“山川开合”四个字，并不是苏东坡本人手笔，而是出自一个叫马盼的歌女之手——这位美丽的风尘女子，“东坡极喜之”，经常带在身边。马盼于书法颇有功底，专学苏东坡，“山川开合”四个字，就是她模仿苏东坡的笔迹。

苏东坡在徐州治水50余年后的1128年，为了阻挡金军南下，杜充掘开黄河，以水代兵，黄河又一次严重改道：正流夺泗入淮，黄河从此经行徐州。一直到700多年后的1855年，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，正流改道大清河入海。从那以后，黄河不再从徐州流过，但留下了大沙河、不牢河和废黄河等河流，并让北方的徐州多了水乡风采。

今天的徐州有不少煤矿，在徐州主城区东北的贾汪区，有一座夏桥公园，公园里立着一块徐州煤矿开采纪念碑。徐州煤矿的大规模经营性开采，始于1882年，苏东也因煤矿名噪一时，成为北方能源重镇。

如果追根溯源，最早在徐州发现煤并开采的，却是苏东坡。

作为一种深埋于地下的化石燃料，中国古代对煤有各种不同称呼，如石炭、石墨、石涅等。《山海经》中有关于煤的最早记载——很巧的是，书中所说的产煤之地，就有苏东坡的老家四川。汉代，煤开始用于冶铁。到了苏

陆波岸

我人生第一个梦想就是当个“孩子王”，站在琅琅书声里陪伴一批又一批大山的孩子慢慢长大，任由流年匆匆，不为风雨惊扰。

我家族有教书的渊源，到我父亲这一代，我的家族已连续有三代“教书匠”。在巍巍大山之中，他们没留下什么功名，只是默默穿越大山每个春夏秋冬，日复一日地教大山孩子识字学文化。为了教书，我曾祖父曾到一所离家100公里外的学校去，在交通非常不便的年代，走一趟至少要一天半时间。我祖父去教书，最远的地方要走五个多小时的山路。

然而，他们在幼小小心田里播下的，并不是清贫与艰辛，而是这份职业所特有的气质与担当。我没见过祖父，只听说他能写一手好字。曾祖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气定神闲的教书先生。周末回来时，他常常会到我家看看，只见他端坐在厅堂太师椅上，手端着茶杯慢条斯理地讲着自己见闻，发表对乡间人事的见解，做事不紧不慢，谈吐有张有弛。

父亲给我的印象更加深刻，他最远要走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教书的学校。课堂上，他一笔画教着孩子们认识“人、口、手”，即便纷纷扬扬的粉笔灰落满肩头，依然神情并茂，没有丝毫懈怠。下课后，他和同事坐在学校那座教室兼宿舍的老木楼走廊上，吹着大山四面来风，闲聊三国君臣将相，漫谈世间人情冷暖，悲情感叹连连，豪迈时笑声爽朗。

那个年代，大山像铁桶一样闭塞，我见过最大的“官”是村干部，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，脑袋里也没有类似神圣和伟大等字眼。一个小学三四年级的大山小孩，只是懵懵懂懂觉得能做像父亲这样的教师真好。

初中毕业那年，父亲想让我读中师。当然，他的想法没有我小时候的梦想那么水灵，而是带着几分现实的人间烟火气。他认为，读中师只要三年就可以工作，急火急锅吃急饭，减轻家庭负担，还能保个“铁饭碗”。上高中的话，时间长，负担重，最主要的是能否考上大学，神仙都保不了。

但是，父亲没有将我的前途命运付诸武断，他想征求我三叔的意见。三叔公在省城工作，山里没有电话，书信来回要走半个月，他干脆带着我上了省城。

在省城住了三天，三叔公一直没就我上学的事做任何表态。临回大山的那个晚上，他坐在饭桌上语重心长和我父亲说，他是我们那片深山老林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第二个，希望我能读高中，给大山再圆一个大学生梦。

也许是某种机缘，我高中毕业后还是读了师范院校。刚刚上学那阵子，我时常陶醉在这样一片充满幻想的空间里——毕业后，当一名中学语文老师，站在讲台上，和学生一起

(上接10版)今天的诸城市区，潍河南岸，恐龙公园与张择端公园之间，耸立着一座高大的仿古楼台，那便是重建于十多年前的超然台。至于苏东坡所建的超然台，尽管历代不断修葺，依然于上世纪40年代末完全毁弃。幸好，我们知道，真正永恒的亭台，只能矗立于人心之中，而非大地之上。

### 徐州：他年谁识此时心

我犹记得，第一次到徐州时，曾有过一些小小的惊讶。

这座以交通枢纽和能源基地著称的城市，想象中，应该偏工业，偏僻派；然而，没想到的是，城中心竟然有一列秀丽的山峦，山下有一汪清幽的湖泊。城郭内外，还有河流迂回缠绕。明山丽水，让这座北方城市有了南方的湿润和秀气。

山叫云龙山，湖名云龙湖。遥想当年，苏东坡多次登临云龙山。曾经，一个恬静的春夜，月光淡淡，杏花怒放，他和客人在云龙山上饮酒，他也曾在山上遥望山下烟波浩淼的云龙湖——那时，云龙湖叫石沟；后来以讹传讹，称为石狗湖。

至于那条迂回的河流，更是大名鼎鼎，那就是废黄河，又称故黄河。

不过，苏东坡没有看到过废黄河。在苏东坡时代，黄河还没有流经徐州——而到了今天，黄河已结束流经徐州的历史。

游荡于中原大地的黄河常发大水并造成严重水灾。徐州任上，下车伊始，苏东坡便面临洪水的严峻考验：四月，苏东坡来到徐州；七月，黄河在澶州决堤。由于其时的黄河河道距徐州足有四五百里之遥，一个月后，在平原上四处泛滥的洪水终于波及徐州。

当洪水抵达徐州城下时，水深近三丈，高于城中平地一丈多，泡在水中的城墙，随时有倒塌的危险，有钱人纷纷外逃。

身为徐州最高长官，苏东坡认为，如果有钱人都跑了，只会引得天摇地动，无法抗洪。苏东坡一方面禁止所有人员外出，另一方面向他们保证，他会与他们一起守城。接着，苏东坡前去动员驻守当地的禁军，尽管调动禁军需要朝廷命令，但苏东坡希望禁军将领事急从权，“河将富城，事急矣，虽禁军宜为我尽力。”禁军将领慨然应允。

治水守城时，苏东坡就住在城墙上，指挥军民分头堵水。其时，洪水加上两天暴雨，徐州城外，茫茫一片，房屋冲毁，老弱随水而没，一些强壮的人侥幸躲在小山丘或是树上，却因缺少食物而饿死。苏东坡派水性好的人驾着小船，带着粮食四处救援。

此后，一个叫应言的和尚向苏东坡建议，凿开清冷口，把积水引入黄河故道。苏东坡采